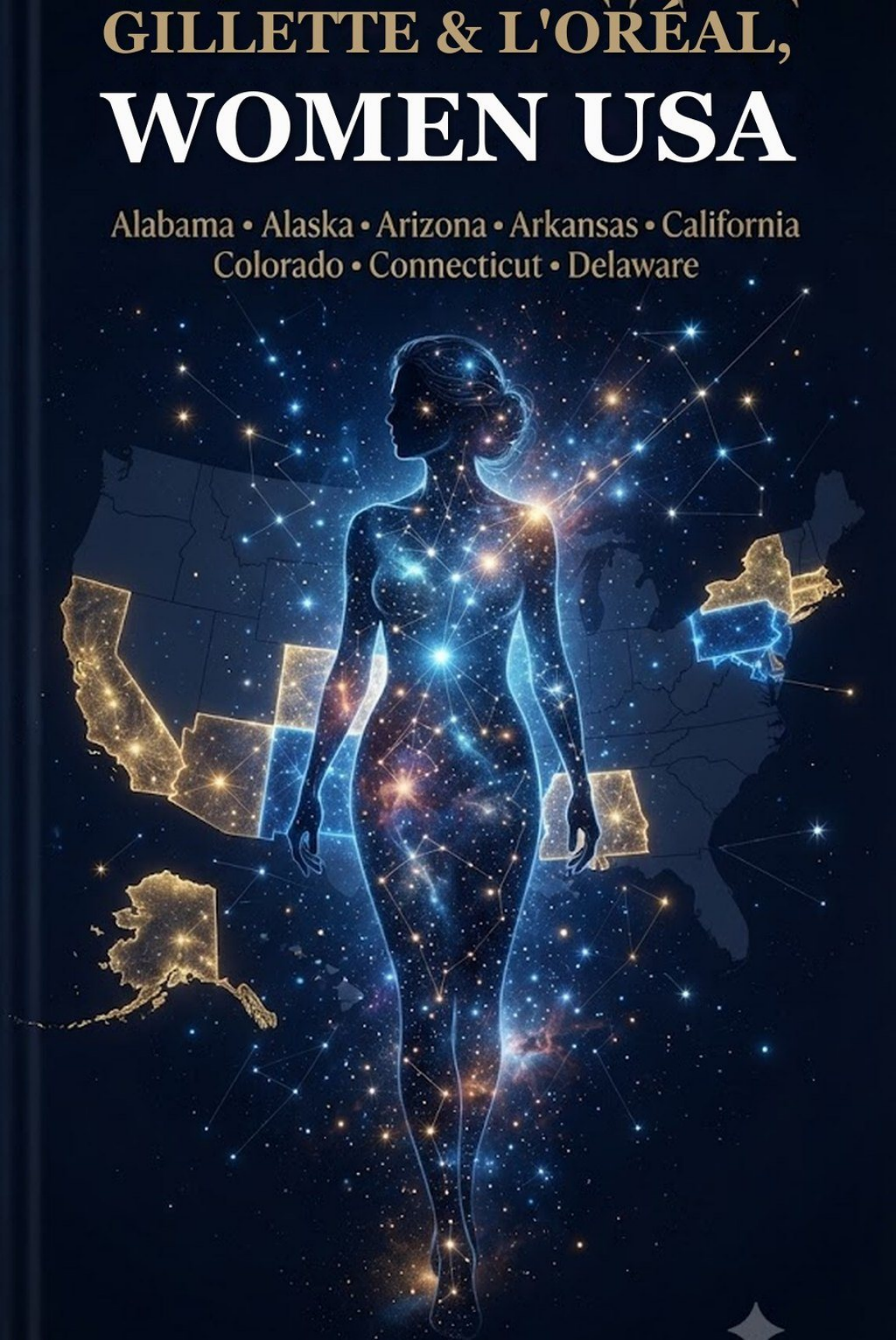
GILLETTE & L'ORÉAL,

WOMEN USA

Alabama • Alaska • Arizona • Arkansas • California
Colorado • Connecticut • Delaware



GILLETTE & L’ORÉAL, WOMEN USA — VOL. I

L’ORÉAL THROUGH GILLETTE · 00

穿越美国的第一程：阿拉斯加州、亚利桑那州、阿肯色州、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康涅狄格州、特拉华州。以第零章开篇——这是本系列六卷共有的北极序章。

第零章——共同的开篇

这一开篇章节为《美国女性》全部六卷所共有。此处完整收录，并折叠起来，以便按顺序阅读本系列而不必重复。

第零章

在这里，世界不是一片领土：它是一道极限。北极不欢迎人，不原谅人，不给错误留任何余地。白色作为一种绝对的存在统治着一切，寂静，没有记忆。温度不是气象数据：它是一头猎食者。黑夜一连持续几个月，碾碎思想，扭曲人的轮廓，吞没人的意志。

这里的群落很少，很小，很封闭。因纽特人、尤皮克人、北极诸民族生活在没有人会选择停留的地方。在这里，每一个人对群体的生存都必不可少。如果你没有用，你就成了负担。而成为负担的人，会消失在寂静里，消失在雪里，消失在一个毫不让步的环境的逻辑里。

科考站又添了另一种寒冷：等级的寒冷。在这里，女人是罕见的存在，是一个必须适应、否则就会倒下的异数。

在这个地方，“失踪”这个概念并不存在。只有抹去一切的白色。

因纽特与尤皮克女人

北极的女孩不是被宠大的：她是被锻造出来的。她很早就学会抵御寒冷、黑暗和饥饿。她必须对氏族有用，因为在这里，身份不是个人的。它是功能性的。女人扛起家庭和群落的重担：食物、火、孩子、兽皮、照料。没有人谈权利。没有人谈脆弱。抑郁存在，但它没有名字。暴力存在，但它没有证人。

科考站的女人

受过教育，能干，习惯纪律。她以研究员、技术员、医生的身份来到这里。她很快发现，北极不认学历。在这里，只有心理上的坚韧才算数。男性的等级制度压在她头上，任何一丝软弱的迹象都会被当成软弱。这是一个光有力量还不够的环境：需要的是极端的自制。

西方的“外来”女人

她在自由中长大，来的时候相信自己能征服寒冷。但这个地方会把她击碎：孤独，狭小的空间，没有尽头的沉默。科考站不是群落，它们是机器。而一个女人，身处一台由男人设计的机器之中，必须奋力挣扎，才不至于消失。

去往世界尽头的旅程

我的邻居Antonio，大家叫他Nino，多年来一直在说北角，说午夜的太阳，说那几个月没有黑暗的日子。那是他揣在口袋里的一个梦，像一件不可能的事。五月的一个早上，我按响他家的门铃，只说了一句：“收拾行李。我一小时后回来。我们30天后回家。”他看着我，又惊讶又高兴。他妻子很担心，问我们打算做什么。“去追一个梦，”我回答。

我们上了车。我们的妻子看着我们，像看两个疯子。但这趟旅行是真的。Nino已经满肚子问题。“我们去哪儿？我该带多少钱？”

“放松，”我对他说。“54个小时就到。才5,000公里。我们坐的是新的Range Rover。享受这一路吧。”

每300公里我就得停一次：他比我大十二岁，有他自己的节奏。我带着水和饮料；他要喝咖啡，还有身体上的需要。我们走得越远，他就越多地讲起自己的人生。要不是那条没有尽头的路，这些事我永远不会知道。

两个男人单独坐在车里，总是在聊女人。他这辈子只认识过他妻子一个。我笑了。我安慰他：“我们都一样。”

他问我连开60个小时的车，是怎么保持清醒的。我跟他讲起俄罗斯，22岁那年，我开了51个小时的车，去见一个从未谋面的女人。“距离不是极限，”我对他说，“它们是借口。我从来没有过借口。”

抵达白色之中

我们进入了挪威。路边一家旅舍。我们会把车留在那里，坐雪橇继续往前走。

向导裹得严严实实，看不透。她摘下护目镜时，我才发现那是个女人。一个挪威女人，沉默，直接，冰冷。Nino坐在雪橇中间，她在前面，我这个190厘米的个子在后面压阵。

天还亮着。我的表显示着时间，却没告诉我那是夜里还是早上。那是午夜的太阳。我们到了北角。

Nino哭了。他抱住我。我笑着对他说：“小心点……别人会以为我们是同性恋。”我们笑了，但我们正站在世界的尽头。

接着来了严寒：零下52摄氏度。

进入真正的北极

他们把我们带到一个金属集装箱里换衣服。极其沉重的加厚连体服，用复杂的拉链封着。

向导的钱是我付的。Nino被留在一个冰屋里，和几个男人一起；我被留在另一个冰屋里，和一家人一起：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还有三个三十到五十岁的女人。

那是一个封闭的世界。简单。粗砺。

男人待在一边。女人们维持着节奏。厕所是离冰屋五米远的一个小坡：大便还没落地就冻住了。我的第一泡尿变成了一颗黄色的北极星。那是北方在向我问好。

那个中年女人Magi会说一点英语。其余的都靠手势、眼睛、双手。寒冷的语言。

我不知道那身连体服怎么用的时候，她想都没想，就碰了碰我的裆部，给我看一条藏起来的拉链。没有恶意，没有尴尬：只有功能。生存。

冰屋里的三天

她们端来食物。熏鱼，生鱼，鳕鱼肝，鲸鱼肚。还有鲨鱼丸子。没有选择。没有别的办法。那就是大自然给的东西。

然后我喝了一种红色的液体。我以为是葡萄酒。那是过滤、煮沸、加了糖的鲸鱼血。我喝了下去。它给了我一种从未有过的力量。一种原始的能量。我以为是可卡因。不是。那是北方进入了身体。

女人们看着我。老人出去打猎了。我休息，喝血。三天没有电话，没有网络，没有电脑，没有Nino。只有我和她们。

没有黑夜。只有光、火、冰和呼吸。

三个女人躺下睡觉。我找地方。最年轻的那个抬起胳膊，示意我靠过去。她们一下子大笑起来。我不明白。她们说我是她们的“圣诞节”。

那是在说，我被接纳了。

我想给她们一点钱表示感谢。她们拒绝了。她们只想要一个拥抱。还有几句卡拉布里亚方言，好让彼此觉得更近一些。

在那里，我明白了真正的礼物的价值：那些买不到、也卖不掉的东西。

向导的告别

三天后，向导来了。她和三个女人谈了一个小时。我在外面。我听不懂她们在说什么。那不关我的事。那是她们的语言，她们的世界，她们的法则。

在集装箱里，我正在脱衣服的时候，向导走了进来。好奇。直接。北欧式的。她紧紧抱住我。她吻了我。她的皮肤白得像牛奶。她的眼睛蓝得像八月的天空。

她求我带她走。为了离开那个世界，她什么都愿意做。

我恭敬地笑了笑。我不能。我不该。

我只给她留下一个承诺：“如果你需要什么，给我写信。我会帮你。”她连钱都拒绝了。她是个美丽的女人，却很孤独。一种远远看不出来的孤独。一种寒冷不会原谅的孤独。

回家

我们去接Nino。他激动极了。他不想回去。但我和他妻子有约在先。

他把他的三天讲给每一个人听。我一言不发。我从来不跟男人分享任何东西。只跟纸分享。

于是，当Nino回到他的世界时，我已经在去往另一个世界的路上。另一个目的地。另一场相遇。

欢迎。

尾声

北方不会带走你：它改变你。而且它从不

把完整的你还回来。男人来到北极，寻找光、寂静、照片、梦想。女人留下来，为了活下去。

男人讲述他们看见的东西。女人对她们经历过的东西保持沉默。

男人回去了。女人留下来。她们留在寒冷里，留在雪的房子里，留在没人听见的沉默里。她们留下来，支撑那些从不颂扬她们的群落。她们留下来，保护孩子、老人、陌生人。她们留下来，无人看见。

我从那里只带走了一段记忆：一个美丽的、美得不可思议的女人，却孤身一人。不是浪漫意义上的孤独。是人的意义上的。是悲剧意义上的。

反思

北方杀死的不是身体。它杀死的是存在。剩下的只有白色：一个女人同时活着又消失的地方。

这就是我写作的原因。因为极端的地方不会讲述自己的故事。而穿行其间的人，没有保持沉默的奢侈。

我不会。我不会。我的土地生下了我，而世界其余的地方迎接我，不是把我当作客人，而是当作家人。

从北方绝对的白色里，我降落到美国绝对的混乱之中。

美利坚合众国

不可能的任务

为一家美国公司工作十八年，会给你一样世界上任何别的公司都给不了的东西：一种工作文化，一套流程，一个清晰的使命，还有一套价值体系——它们不是理论，而是每天的实践。他们不向你解释这些；他们在你身上把它们建起来。而且不征求你的同意。

我在纽约的办公室里，有人给了我一份我从未想象过的工作。不是升职。不是调动。是一场实验。

一个保密项目，为了在美国境内验证一种人际关系模式而设立。他们挑选的不是经理，不是心理学家，也不是培训师。他们挑选的是拥有某种真实世界经验的人。我的名字出现了——尽管我做了十八年销售。他们看的不是职位：他们看的是头脑。

这项测试解释起来很简单，完成起来却极其困难：

一年之内走遍美国50个州，城市由我自己选，每个地方至少待一个星期。

最后两周是强制休假。所有费用由他们承担。我只需要生活、观察、理解，每个星期一交一份报告。一份有人味的、干脆的、精确的记述。

我签了合同。我通知了家里。家里什么都没问。他们只想知道每个月的补给到了没有。我即将面对美国的一整年。他们，和往常一样，面对的是下个月。

为了稳妥起见，我的工资直接打进我在意大利的银行账户。这是一种客气的说法，意思是：“别干蠢事。用你手里有的过日子。我们看看你到底是谁。”

直到十五年后，我才拿到我当年的原始报告、那些分析，以及他们收集的关于我的材料。这本书就是从那里诞生的。我获准出版它，条件只有一个：永远不说出委托这项工作的公司的名字。

这不重要。这个故事讲的不是标志。它讲的是一个男人，身处一个除非亲身经历、否则不可能理解的国家。

从最远的地方出发？

合乎逻辑的选择是从边缘出发，而不是从中心。理由很简单，有两个：

1. 我刚开始这场实验：头脑最清醒，注意力最集中。

2. 从极端出发，我可以修正路线，干净利落地走完全程。

我不需要从波士顿或芝加哥开始。我得从一条边界开始。从一个只在纸面上属于美国的地方开始。

我选了阿拉斯加的首府朱诺。与世隔绝。只能坐船或坐飞机到达。一座不属于任何人的城市。出发的完美地点。

优化资源

出发之前，我做了一件美国人首先会尊重的事：我像一个专业人士那样安排自己，而不是像一个游客。

我打电话给三家最热门的航空公司，就是国内航线网络最大的那几家。不到一个小时，我就以六折买下了一本五十张的国内航班票册。

没有时间限制。没有天数限制。没有任何约束。只有一个条件：一年之内用完。

我对连锁酒店、Uber出租车和租车公司也如法炮制，然后认真做了一份行程表：各个站点、方式，但不写时间。

我准备好了。

那是我第一次真正的成功。第一个信号是，我知道怎么移动。美国奖励行动的人，而不是等待的人。

公司看到这笔交易时，做了美国文化一贯会做的事：他们核查了可靠性。

我能不能应付一整年不停的移动？我能不能处理意外、距离和紧急情况？我是不是独立的？

正因为如此，出发之前，我又落实了一个关键细节：

我确保我的信用卡每月至少有100,000美元的额度。

这笔钱不是用来花的。它是用来证明我们管得住它。美国人就是这样想的：如果你没有自主，你就没有自由。如果你没有自由，你就无法被评估。

从那一刻起，这个项目不再是一项任务。它是一项使命。

现在，真正的旅程开始了

阿拉斯加属于美国，只是在地理上。它是另一个世界。

那是女人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地方。是报案永远到不了目的地的地方。是城市不过是野蛮大陆中央几座文明孤岛的地方。

朱诺是我的第一场考验：一座没有任何公路与国家其他地方相连的首府。一块感觉不像美国的美国。

在这里，我开始明白一件事：这趟旅程不会是地理上的。它会是人的旅程。

第一组（第一卷）

亚拉巴马、阿拉斯加、亚利桑那、阿肯色、加利福尼亚、科罗拉多、康涅狄格、特拉华、佛罗里达、佐治亚

第二组（第二卷）

夏威夷、爱达荷、伊利诺伊、印第安纳、艾奥瓦、堪萨斯、肯塔基、路易斯安那、缅因、马里兰

第三组（第三卷）

马萨诸塞、密歇根、明尼苏达、密西西比、密苏里、蒙大拿、内布拉斯加、内华达、新罕布什尔、新泽西、新墨西哥

第四组（第四卷）

纽约、华盛顿

第五组（第五卷）

北卡罗来纳、北达科他、俄亥俄、俄克拉何马、俄勒冈、宾夕法尼亚、罗得岛、南卡罗来纳

第六组（第六卷）

南达科他、田纳西、得克萨斯、犹他、佛蒙特、弗吉尼亚、西弗吉尼亚、威斯康星、怀俄明 亚拉巴马 亚拉巴马不只是美国的南方。它是一段永远不会冷却的历史。在这里，奴隶制不是一个章节：它是一道阴影。种族隔离不是一段记忆：它是一道伤疤。信仰不是安慰：它是控制。在这个州，一切都沉重。炎热沉重。家庭沉重。传统比什么都沉重。宗教像一条皮带一样勒紧喉咙。群落在观察，在评判，在记住。没有什么被真正遗忘。没有什么被真正原谅。而在这一切之中，有女人。经营着整个家却从未被提起名字的女人。打三份工、天不亮就起床给孩子们收拾的女人。星期天在教堂里祈祷、星期一在沉默中发抖的女人。丈夫被工作累垮、或者男人什么都不干的女人。在同一天里，既是母亲、女儿、祖母，又是生活支柱的女人。

亚拉巴马女人的生活是一只不停摆动的钟摆：

——有人很早就离家，结婚，逃走，长大得太快

——有人又回来了，因为一次离婚，一份丢掉的工作，一场被噤声的暴力

她们是锻造出来的女人。不脆弱。不叛逆。不是受害者。

锻造出来的。

她们的抵抗是沉默的，却是绝对的。那是一种不能垮掉的人的力量，因为没有人会把她们扶起来。

餐馆女招待

那里散发着咖啡和油炸食物的味道。我立刻想起一条到哪儿都适用的规矩：一个地方看起来越穷，饭菜就越好。这些道理是我在路上学到的。它从来没让我失望过。

她叫Carol。

金发——也许是天生的，也许不是——一双粗糙的手，一个很快的微笑，一双黯淡的眼睛。她以同样疲惫的优雅招呼着每一个人。而没有人真正看她一眼。

我看。当我看见一个在干活的天使，我忍不住要跟她打个招呼，给她一个微笑。这是我能做的最起码的事。她把我领到桌边。“你想吃什么？”她问。要是在意大利，我会说出我的真话。我还是试了一下：

“我想要你。”

她茫然地看着我。或者是假装没听懂——就像某些本地人，什么都听懂了，却说什么都没听懂。再说一遍毫无用处。于是我点了菜：

热狗。啤酒。一杯美式黑咖啡，再加一份甜点。

我勾起了她的好奇心。从她的动作里我看得出来。几分钟后她回来了：“我十分钟后下班……我能坐下吗？”

我同意了。

她坐下来，背驼着，像一个从不休息的人。她看着我的眼睛，不带一点戏剧性地说：

“我是被逼着干这份工作的。我丈夫死在了伊拉克。我没有孩子，没有亲人。而街头……那不是我能干的活。”

我没有回答。有时候，话语就是一种侮辱。我握住她的手。用力一握。一个干脆、干净的动作。

我在她的掌心里，留下了一百美元。

我站起来。我走了出去。没有回头。但透过玻璃，我看见了她。她猛地站了起来，好像吃了一惊，好像受了伤，好像满怀感激。她结结巴巴地说着什么，却没有说出来。

就在那里，我明白了Carol生活的真相：

她从来不坐下。

福音歌手

那是一个和平常一样的星期天。我感到需要触碰一下我精神上的那个自己，而在亚拉巴马，这就意味着去教堂。在那里，信仰不是宗教：它是一个舞台。

我从正门走进去的时候，牧师正在结束他的布道，那扇门因为天热而大敞着。我没有选侧门。我想让那个小群落注意到我的到来。

他看见我，大声说：“欢迎你，陌生人。”我回答：“也欢迎你。”

我坐了下来。管风琴开始震动：一种尖细的、熟悉的声音，那个“美国的幽灵”，即使没有任何名人在场，也让我想起艾瑞莎·富兰克林。然后，她走了进来。

她的声音不是在唱：它是在挣脱。

她是非裔美国人，不是那种不引人注意的人，而是命运只摆在你面前一次、好提醒你一个人在被生活碾压时能做到什么的那种人。她的声音巨大。她的生活渺小。她星期天唱歌，是为了呼吸。她整个星期保持沉默，是为了活下去。

结束的时候，人们站起来离开，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我走了过去。她很惊讶：在那里，没有人会感谢福音歌手。那就像感谢空气：所有人都觉得理所当然。

我握了握她的手。我微微鞠了一躬，那种只留给高贵女性的鞠躬。因为她拥有一切，或者几乎一切。她缺的只是我。而那一分钟，我在那里。

“你是谁？”她问。我回答：“我是从天花板上专门为你降下来的天使之一。多亏了你，我今天仍然是个人。我再也不回去了。”

她笑了。好兆头。我什么都没在推销。我什么都没在寻找。我在吸收。一如既往。

她的好奇心眼看就要变成一个问题爆发出来，但我已经朝出口走去。然后，事情发生了。

她的声音在叫我：“先生！先生！陌生人！”一声响亮的呼喊，里面充满了空气，还有某种不是痛苦的东西。

我没有转身。我分得清求救的呼喊和问“为什么”的呼喊。那是一声“为什么”。它不需要回答。我的敬意留在了她的脚下。那是我的记号。她会去书写她余下的人生，那段从来没有人为之鼓掌的人生。

女大学生

她生活在书本和隐蔽的歧视之间。我坐在校园外面，等一位后来当了那里教授的前同事。校园里满是到处跑、到处笑、假装没人在看他们的孩子。她不是。她在看。

我的前同事到了，紧紧地拥抱了我。那个女学生看见了这一幕。她没有移开目光。我回抱的时候，看着她。只看着她。

那位教授还得赶去别的地方。她匆匆道了别，带着一丝怀旧的神情，把我留在了院子中央。我走过去，坐在喷泉边上，挨着那个女学生。她笑了。那种既不是邀请、也不是防御的笑：那是真实。

“你的梦想是什么？”我问她。“你年轻，聪明……而且他妈的漂亮。”

她没有脸红。她没有得意。她回答得很干脆，像一个已经学会与现实共处的人：

“我梦想逃离南方。

可南方到哪儿都跟着我。”

我点点头。“你知道我是哪儿来的吗？”她摇摇头。“意大利南部。”她顿了一秒。然后她笑了。一声短促的笑，那种能在重压上打开一扇窗的笑。

我们说得不多。但已经够了。

“我们生来就要与身份、过去和期望搏斗，”我对她说。“我们总是要求别人改变，可真正的改变从我们自己开始。”

她很年轻。但她背负的分量并不年轻。而她背负得很有尊严。

离开之前，我想给她留下点什么，不是一番演讲，也不是一个承诺。只是真话。

“记住，亲爱的：

南方之于北方，就像女人之于男人。”

她看着我。她明白了。不需要别的了。

我站起身。“再见。祝你好运。”

她没有回答。她只是笑了。那个笑容里的未来，比整个校园加起来还多。

现代种植园的女人

我约了州商会的会长。我以前在意大利当过顾问，某些机构里的门道，一旦重新接触，就会浮上心头。他高，瘦，优雅。一块金表。一股古老财富的淡淡气味。那种你不拿出来炫耀的财富：你穿在身上。因为这里的富人身上没有钱的味道。他们身上是一切的味道。

他为他的州骄傲。太骄傲了。他深信亚拉巴马的经济撑起了整个国家，决定带我去一个棉花种植园来证明这一点。先是土地。然后是加工。然后是现代农业产业，那个卸掉了锁链、却留下了同样节奏的产业。

就是在那里，我看见了她。

太阳灼烧着她的背。她的动作慢得可怕，精确，没有一句怨言。她是一个正当壮年的女人，脸像是被劳累雕刻出来的。一家人压在她肩上。她的皮肤布满纹路。她的眼神很硬。那是一个从来不允许自己犯错的人的节奏，从来不。

我问会长能不能和工人们说说话。我说我想“了解得更清楚一些”。一个借口。我只是想和她说话。

我走近了。她跪下来，亲吻我的手。一个古老的、不合时宜的、不属于这个时代的动作。我立刻制止了她。

“站起来，”我对她说。“我不是主教。也不是教宗。我只是一个和你一样的人。”

她没有回答。她几乎没有看我，就像那些看不起真正去看的人那样。我沉默了几秒钟。然后我离开了。但事情还没有结束。

第二天，我一个人回去了。我想在没有政治排场的情况下再见她一面。

我等着工人们出来。她看见我，垂下了眼睛。羞涩。敬重。还有一种被压抑的想说话的渴望。

我用一个缓慢的手势让她停下，没有强加任何东西。她是南方那种隐藏的延续的面孔：那份从未被抹去的古老劳苦。只是藏得更好了。

我握住她的手。我递给她一张我一直随身带着的毕奥神父的小照片。在背面我写了：

“痛苦不会因为过去了就被遗忘。

只有在你原谅的时候，它才会被遗忘。”

我什么都没再说。不需要。她做了一个小小的动作，点了点头，别人都看不见。但对我来说，那就是一切。

尾声——亚拉巴马州

亚拉巴马不是一个州：它是一场审判。一个过去不会过去、现在不必请求许可的地方。一切仍然写在两行字上：谁站着，谁倒下。而站着的，永远是一个女人。

我看见了四张不同的面孔，却是同一个真相：从不坐下的女招待，为了呼吸而歌唱的福音歌手，梦想逃离一个紧追不舍的南方的女学生，新种植园里的女工，一份古老劳苦的继承人。四个故事。同一个根。同一场沉默的战斗。

在亚拉巴马，女人生活在一种既保护又惩罚的信仰里，一个既支撑又窒息的家庭里，一个既观察又评判的群落里。然而她在抵抗。她不让步。她不折断。她不为自己辩解。

男人把他们的南方说成骄傲的来源。女人把它当作一场考验来经历。

反思——亚拉巴马州

真相很简单：男人在哪里炫耀名号，女人就在哪里统治世界。

亚拉巴马教会我，有些生命不需要声音来呐喊。它们需要有人倾听。而我，又一次做了我会做的事：经过，观察，理解，然后离开，不去打扰。

因为美国的南方，和全球的南方一样，有一条几个世纪以来始终成立的规矩：住在那里的人不会改变。看见他们的人会改变。

我看见了。我不会再是原来的样子。

阿拉斯加州

阿拉斯加不是一个州：它是一条活着的边疆。一片像大陆一样辽阔的土地，在这里，人是客人，自然说了算。有些城市只能靠飞机相连。有些村庄一个月才见一次医生。有些家里，电是奢侈品，热水是特权。在这里，寒冷不是气候：它是一个角色。它塑造人，铸就习惯，强加沉默。生活由不可能的距离、艰苦的劳动和深深掘进人心的孤立构成，它改变了我们说话、爱和生存的方式。

原住民群落承载着几个世纪的传统。女人是基石：她们维持家，抚养孩子，把群落凝聚在一起。但她们不是发声的人。她们常常没有空间说出自己承受的东西。

在城市里——安克雷奇、费尔班克斯、朱诺——世界转得更快，但孤独依然一样。女人来这里寻找工作、自由、未来。许多人最后被郊区吞没，被石油公司的轮班吞没，被糟糕的关系吞没，被机构的沉默吞没。

在阿拉斯加，一个女人倒下时，那声响传不到任何地方。寒冷覆盖一切。消失的东西，就一直消失下去。

出租车女司机

从机场到酒店的这段路就够了。在结冰的路上开了四十五分钟，一个四十岁的寡妇一秒钟都没停过嘴。在阿拉斯加总是这样：人们独自生活，可一旦遇到一个肯听的人，就会敞开心扉，好像那是他们的最后一天。

我早就决定，那一整趟旅程我都做一个作家。没有角色，没有公司，没有测试。我保持匿名，因为说实话，我自己也不太清楚我在找什么。我只知道有人付钱让我去理解一些他们没有说出口的东西。她从老一套的问题开始：年龄，工作，结没结婚，有没有孩子。我只回答：“我订婚了。”

她一下子笑了出来。而笑声，在阿拉斯加，是赢得一个女人信任的通行证。那一刻，我进入了她的世界。

我们到了酒店。她停好车，找了个借口，提着我的行李箱陪我走到房间。我立刻明白了一件事：一个女人想要什么的时候，她不会开口要。她会去拿。

这是我得小心的第一个信号。这不是冒险，而是尊重：一个在阿拉斯加夜里独自开车的女人，如果没有学会比任何人都更会看透男人，是活不到四十岁的。

我们一直是朋友。直到今天我们还在通信。她向我讨主意，每一次都重复同一句话：

“你能解决所有人的问题，可你自己却没有问题。你有的是机会。”

一个为了活下去而在严寒里开车的女人。而她对别人的理解，从来都比别人对她的理解更多。

边境女警

早上我出去散步。旅行时我总是这样做：把证件和钱包留在酒店，只带一张酒店的名片。这个习惯我已经保持了好多年。我正看着那些房子、那份寒冷、阿拉斯加的寂静，毫无预兆地，两辆警车开了过来。两名女警冲了出来，封住交通，拉起黄色的警戒线，把一片区域围了起来，好像刚刚发生了一起谋杀。

我站在那儿看着，可没过几秒，其中一个就命令我待在原地。她们要把我当作证人问话。

目击什么？

我什么都没看见。我只是一个出来散步的男人。

“案子”是这样的：一条狗被噎死了。有人喂它吃热狗，却没给它水。在阿拉斯加，这也是犯罪。

那一刻，我以为自己走进了一个电影片场。但这是真的。这是阿拉斯加。而我就在那里。

她们扶我上了她们的车，送我回酒店去取证件。两人中的一个法语说得很好，开始用法语问我问题。

狗死了。必须找到罪犯。我在现场，所以我得接受询问。

我说我爱动物。说我在意大利养了两只。而按照那种北美式的、无法解释的逻辑，这就足以认定我“没有嫌疑”。

紧张缓和了。手续烟消云散。一份晚餐的邀请来了。

那个女警脱下制服后，身上有一团你在冰天雪地里想不到的火。忘掉那些关于墨西哥女人或西班牙女人的刻板印象吧：阿拉斯加的女人火热，是为了生存，不是为了玩。

晚餐简单，直接，毫不做作。我的笑话让她笑得像好几年都没这样笑过。在这里，在这么偏远的地方，笑声是稀缺的东西。

最后，我们道了别，没有承诺，也没有期待。只剩下一样东西，强烈而锋利：

沉默。

那种在阿拉斯加每一个故事之后总会到来的沉默。它比冰还要沉重。

大学女孩

我在酒店问过图书馆在哪里。对我来说，那一直是个理想的地方：里面安静，外面是话语。一个人们穿上平静、一走出门就变回原样的地方。

我一眼就注意到了Elga——那里的秘书。她戴着一副时髦的红框眼镜。这样一个细节，戴在一个北方女人身上，传达出风格、个性和

一种天然的性感。我请她出去喝杯咖啡。她没有多想：她锁上图书馆，我们就走了。

我们到了公交车站，可我们要坐的那班车几分钟前刚开走。一个没有接通的电话。一班错过的车。那种会变成机会的小小裂缝之一。

她没有泄气。她挽起我的胳膊，好像认识我好多年了，把我领进了她家。她泡了英式红茶，拿出饼干，一种简单的、近乎孩子气的款待。我是碰巧在那里的意大利人，她是一个寻找一点未来的年轻大学生。在那间整洁的小客厅里，我明白了一件事：在阿拉斯加，善意是一个短暂的动作。一个即时的行为。它不是礼节：它是必需。

她在找一个丈夫。她没有说出来，但她的每一个举动都写着。我做了唯一一件我真正会做的事：我给了她一些建议。该握住她的手的人不是我。我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给予，不是为了索取。而那不是我的时候。

三年后，我收到一封电子邮件。一张照片。她，怀里抱着一个孩子。还有一句话：

“我给他取了你的名字。

不是出于爱。是出于尊重。”

在一个霜冻覆盖一切的国家，有时候，一个小小的举动就足以留下一道永不融化的印记。

家庭主妇

我意识到我正在放弃我的节食。旅行时一天只吃一顿还行，但在阿拉斯加这样的地方不行，那里的寒冷不经允许就把你耗空。我决定离开餐馆，去市场。那是最合乎逻辑的选择：吃得好，也能更好地观察当地人。

在外省的超市里，你什么都能看明白：他们怎么穿，花多少钱，怎么看自己的孩子，怎么应付疲惫。那是这座城市最真诚的橱窗。

我拿起一袋意大利火腿和几块水牛马苏里拉奶酪——在那种严寒里难得的奢侈——这时一辆装满东西的购物车撞到了我的侧面。我本能地以为是意外。但以我的经验，女人从来不会“意外地”做任何事。她们总是知道自己要去哪里。

她看着我说：“火腿和马苏里拉……你一定是意大利人吧？”她一秒钟就抓住了一切：国籍，口味，甚至这次购物的优雅。

她叫Rose，五十六岁。

她和女儿、女婿还有两个外孙住在一起。他们是她的快乐，也是她的负担。那种撑着一个家浮在水面上、却没有人注意到的女人。

我提议去附近的咖啡馆喝杯咖啡。她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她买完东西，放进车里，又开车回到我这儿。

坐在桌边，她开始说话。说了很多。我听着。我没有打断。有时候，最有力的话语是你让对方去使用的沉默。

说到某个时候，她笑着说：“意大利人，爱情，妈妈，比萨，意大利面……”那句建立在刻板印象上的老话，却带着真正的温柔。我心想，她是不是读过我的哪本书。

然后她说了：她是一个作家。而且她买过我的一本书，是用笔名出版的。幸好：她没有认出我。

她继续跟我讲她的生活，满满一屋子的人，每天都一样的日子，害怕让外孙们缺了什么，那种因为显得理所当然而无法表达的爱。

她终于停下来的时候，看着我的眼睛。那是一种胜过千言万语的目光。

我只对她说了这一句：“我明天就去买你的书。然后我把书评寄给你。”

她被打动了。她的声音微微发颤：“谢谢你。你不知道认识你对我意味着什么。多么优雅、多么有礼貌的人……所有意大利人都是这

样吗？”

我像往常一样回答：“看手和脚。在那里，你能看出一个人真正是从哪里来的。”

Rose笑了。那是一个隐形的女人的笑容，她在这一个下午，不再隐形。

尾声——阿拉斯加州

阿拉斯加既不欢迎你，也不拒绝你。它观察你。它掂量你。它让你悬在那里，直到它知道你是否诚实到可以再多待一天，或者清醒到懂得离开。

在这个州，距离不是地理上的：它是人与人之间的。人们生活在只有几秒钟的沉默里，可在这里，几秒钟变成了几个月。孤独是他们的母语。而女人是说得最好的人。我见到了四个女人，四种截然不同的角色，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她们不在等任何人。

出租车女司机开车，是为了不停下来。女警管控着一个无法管控的世界。女大学生在一个夺走当下的地方寻找未来。家庭主妇撑起了一整个家，却没有人看见她。

在阿拉斯加，女人不开口要。她们去做。

那是一个生命短暂、黑夜漫长、真相不需要观众的地方。

反思——阿拉斯加州

阿拉斯加教会了我一件简单而凶猛的事：世界不是分成男人和女人。它分成扛起重担的人，和把重担放在别人身上的人。

在这个州，是她们在扛。

我没有看见脆弱。我看见了尊严。我看见了一种平静，它不是来自安宁，而是来自对风暴的习惯。我看见了不抱怨的女人，因为她们知道，即使抱怨，也没有人会听。

阿拉斯加的女人之所以隐形，不是因为她们不在。她们之所以隐形，是因为没有人看她们看得足够久，久到真正看见她们。

她们是没有时间的母亲，没有作息的劳动者，没有观众的守护者。她们是这个社会里不要求掌声的那一部分。而且永远不会要求。

阿拉斯加的女人不谈论她们的经历。所以现在由我来谈。

亚利桑那州

亚利桑那是沙漠里一道敞开的伤口。一片尘土、峡谷和沉默的旷野，那些沉默不咒骂，它们审判。在这里，太阳不是温暖的。它灼烧。夜晚也不是凉爽的。它分隔。

这是一个边境州，每一条路上都载着一个嫌疑人。移民，边境巡逻队员，原住民部落，退伍军人，卡车司机，单身女人，破碎的家庭：全都混在一片毫不留情的炎热里。

城市看上去很现代，可一旦走出边界，你就能感到真相：亚利桑那是沙漠，是人口流失，是毒品，是文化之间的冲突，是永不熄灭的原住民根脉，是一种没有地平线的孤独。

那么女人呢？在这里，她们生活在风暴眼中：在边境与身份之间，在生存与骄傲之间，在暴力与自由之间。

亚利桑那的女人可以是任何人：霍皮族或纳瓦霍族原住民；墨西哥移民；鬼城里的单身母亲；边境巡逻警官；保留地里的护士；梦想逃离的菲尼克斯女学生。

但每一种角色里，都有同一份重担：抵抗，却不能停下。

边境女警，38岁

与执法者的相遇，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对你所处社会的一次检验。我一直把它当作与这片土地、它的规则、它的局限、它的幽灵的一次正面交锋。

那天下午，我租了一辆车，想感受自由和独立。我深信路是我的。可在美国，路从来不是你的。是它欠你的。

我一口气开了四个小时。然后五个小时。亚利桑那的沙漠毫不留情：无尽的峡谷，令人发抖的寂静，一英里又一英里，看起来都一样。

然后我看见了它。一辆闪着警灯的警车。命令停车。

一个女人走了下来。她有着明显的墨西哥人五官，浓烈的黑眼睛，深色的头发往后束起，红色的嘴唇。深色的Ray-Ban墨镜，还有一副仿佛就是用沙漠本身雕出来的身体。我想都没想，就对她说：

“您是从选美比赛里逃出来的吗？”

她不让任何人碰她一下。“别耍嘴皮子。把证件拿出来，不然我就逮捕你。”

非常清醒。致命。专业。

我把一切都交给了她。老一套的问题：为什么我离边境这么近，我从哪里来，为什么我几个小时一直开直线。“我总不能说我在采蘑菇吧，”我回答。“我想看真正的美国，书里找不到的那个美国。”她让我下车。她检查了一切。然后她打量我。“你为什么不带酒？你为什么不抽烟？”“我以前是打橄榄球的。我的恶习只剩下一个了。”“吃？”她说。“我想要的东西不能吃。只能爱。”“狗？”她笑了。“不是。”她一下子绷紧了。她意识到我说得太过了。那是危险的地带：她有权力，有权威，还有一种不需要请求许可的性格。“你能知道什么东西只能爱吗？”她问。“当然。一切从她开始的那一个，造就了我们的那一个，让我们活着的那一个，带着我们往前走的那一个。”“谁？”“女人。您没明白吗？”她没有回答。她把证件还给了我。“回去吧。这不是你的路。”我服从了。那是最聪明的做法。然后，夜晚来了。

晚上十点，在我酒店的大堂里，我看见她走了进来。便装。同样的眼神。同样的力量。一个确切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女人。

她走了过来。“能喝一杯吗？”

“不能，”我回答。然后我站了起来。

她抓住我的胳膊。“你为什么要走？”

我看着她的眼睛，说了真话：

“逃离危险不是懦弱。那是常识。”

然后我走了。

纳瓦霍女人

那天早上，我起晚了。我稍后要作为特邀演讲者在校园里讲话。我抓起工作包，走到停车场，上了第一辆标着“校园”的公交车。一个简单的、愚蠢的、无辜的错误。

一个小时后，我还是什么都认不出来。不同的路，不同的风景，也没有人下车。然后公交车停了。终点站。

纳瓦霍保留地。

下一班车第二天才开。没有电话，没有联系，没有办法通知同事。我只能第二天露面，解释这场误会。这种事会发生。生活不会提前打招呼。

我一走进保留地，酋长就拥抱了我，像拥抱一个多年后归来的亲人。他把我介绍给他的妻子、女儿和近亲。他们带我四处看看，给我递了一杯酒，然后随口说：

“今天下午我们为你办一场聚会。”

他们等的是另一个人。我却碰巧到了那里。又或者，命运有时会伪装成一个错误降临。我笑了。我接受了。我让沙漠来决定。

野牛肉。血糕。土豆、辣椒和洋葱。啤酒和酒，毫无节制。到处是传统服饰。火在燃烧。缓慢的鼓声。还有酋长的女儿，给我戴上了

一顶插着白羽毛的帽子。

她是一个真正的纳瓦霍人。沉默。专注。习惯了看见一切、什么都不说。那种在传统、劳作、无人报案的家庭伤痕和一种即使在水泥下也不会死去的身份之中长大的女人。

聚会一直持续到深夜。那些场景我在约翰·韦恩的电影里见过，只是反过来了：他们不是侵略者。他们是幸存者。

他们让我睡在酋长的帐篷里，躺在野牛皮上。不穿衣服。一种古老的仪式。我接受了。我在那里不是为了反对一个接纳了我的世界。过了一会儿，酋长的女儿走了进来。同样的方式。没有言语。只有在场。

然后酋长和他的妻子来了，各自裹着自己的兽皮，各自在自己的位置上。他们看了看他们的女儿。又看了看我。高兴。安详。仿佛一切都在它该在的地方。

第二天早上，我找厕所。她指了指一片芦苇地和一条河。

我想在河里洗一洗，可河水浑浊，满是鱼。我走进了芦苇地。那里看起来没人。

我错了。

我刚蹲好，就有两个印第安人手里拿着报纸走了出来，好像那是世界上最平常的事。然后是第三个。然后又是一个。

整个村子都在同一片芦苇地里拉屎。

而我还以为只有我一个人。

回文明世界的公交车就要开了。我不能错过它。

酋长的女儿拦住了我。她的眼睛里有疑问。“我还会再见到你吗？”

我把我的手提电脑给了她。一种保持联系的方式。一个机会。

但那份联系从来没有到来。

因为印第安人的沉默不是缺席。它是历史。它是法则。它是一种不寻求确认的记忆。

鬼城的护士——45岁

我的甲状腺开始闹毛病了。我不吃东西，体重却在涨。老一套。

我去了药店：没有处方，就没有药。我去了超市：没有非处方的版本。剩下的唯一选择是医院。

就在那里，我遇见了她。

Conchita。

护士。四十五岁。她住在亚利桑那那些被遗弃的地区，那里的炎热像诅咒一样压着人，夜里满是吸毒过量、远处的警笛和空荡荡的房子。在鬼城里，人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消失了。

她看着我。她每天看见绝望的人、吸毒的人、受伤的人、破碎的家庭。一个像我这样的人——一个外国人，穿着西装，彬彬有礼，来这里只是为了甲状腺的药——不在紧急问题的名单上。

然而，程序是一道无法逾越的屏障。奥巴马医改确实为所有人提供医疗，没错，但前提是他们住院。

我不该住院。我只需要继续活下去。

我没有坚持。没有必要。我只是告诉她，我住在附近的酒店。我给她留下了我的名字：Ferdinando。别的什么都没有。

我走了。那天夜里，大约午夜，酒店的电话响了。前台问我，是让一位女士上楼来，还是我宁愿下到大堂去。

我选择了下楼。

Conchita在那里。穿着便装。没有制服，没有角色。

“我们能谈谈吗？”她问。我点了点头。

我们去了附近一家酒吧。面对面坐下后，她把手伸到桌子底下，递给我一个小小的白信封。里面是我的药。她递过来的样子，就像有人把毒品递给瘾君子。同样的谨慎，同样的风险，同样的隐秘。

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这样做。我什么都没向她要。

直到她开口，我才明白。

“不是因为药，”她说。“是因为您要东西的方式。那种态度。那种礼貌。那种风度。”

她看着我的眼睛。一个整天身处尖叫、急诊、暴力和贫穷之中的女人，一眼就能认出那些不想索取、只想生活的人。

“我不是对每个人都这样，”她补充道。我知道。

在一片满是缺席的沙漠里，一个隐形的女人决定了要在场。

图森的女服务员——22岁的移民

下午，我突然很想吃点甜的。那不是饿，是缺少温情，我知道。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一家餐馆坐下，点一份甜食。

女服务员马上就来了。个子小，身材纤细，身体单薄，动作却飞快。她看起来就像穿着裙子的Speedy Gonzales的妹妹：她在桌子之间穿梭，好像脚踝着了火。

“你多大了？”我问她。

她连记事本都没看。她狠狠地瞪着我。

“关你什么事？吃完，付钱，走人。你要是烦我，我就叫警察。”

二十二公斤的身体。二十吨的性格。装在玻璃罐里的纯炸药。

老板立刻出来道歉。他全都看见了。我什么错都没犯，但她不是那种会分析的人：她只会反应。

她跟我讲了她的故事。她从墨西哥来，一无所有：没有钱，没有家人，没有靠得住的证件，没有任何确定的东西。她端盘子是为了活下去，盼着一个亚利桑那很少给人的未来。

她很急。急得像全世界的急都在她身上。而那份急，就是她的局限。

我要了一支笔和一张纸。我写了一封信。没有浪漫，没有幻想：只有真话。我托老板转交给她，老板点了点头，就像人们对一个表现出尊重的人点头那样。

第二天，我从那个地方经过。我没有进去。我只是想看看。

突然，我听见身后有急促的脚步声。有人在我背上拍了一下。

我转过身。

是她。

憔悴的脸，紧张的眼睛，急促的呼吸。

“我二十二岁，”她说。

“你他妈到底睡在哪儿？我找了你一整夜。连警察都不知道你在哪儿。”

我看着她。她还是前一天晚上的那个女孩，只是卸下了盔甲。一个身处吞噬大人的世界里的孩子。

我跟她道了别。然后我走了。不是出于冷漠。是出于尊重。因为有些脆弱不该去碰：你必须放它们走。

尾声——亚利桑那州

亚利桑那不是一片风景：它是一条边界。而边界不是用来穿越的。是用来面对的。

在这个州，炎热不是温度：它是审判。沙漠不是空间：它是孤独。人们不是在生活，他们是在抵抗。

我遇见了四个女人，她们都有同一个词：生存。边境女警，全副武装，却和她巡逻的沙漠一样孤独。纳瓦霍女人，一片毫不宽恕的土地和一段永不愈合的记忆的女儿。鬼城的护士，在无人看见处疗愈生命，拯救那些一无所有的人。移民女服务员，二十二年的愤怒和脆弱，与一个比她大得多的世界交战。

四条不同的路。心里是同一片沙漠。

在亚利桑那，女人不等待未来：她们用尽全力去寻找它。找不到的时候，她们继续走。因为停下来就意味着消失。

男人穿越这个州，是为了看峡谷。女人穿越它，是为了不死。而她们在沉默中做这件事，不向任何人要任何东西。

反思——亚利桑那州

沙漠教给你一件事：没有人能独自活下去。

然而，亚利桑那的女人正是这样做的。每一天。每一夜。在一种令人窒息的气候里，在一个要求你坚强、哪怕你做不到的社会里。

她们是没有时间抱怨的女人。她们没有时间做梦。她们没有时间犯错。

而我，又一次做了我一贯做的事：我遇见她们，观察她们，倾听，然后放她们走。因为尊重也来自于不去挽留。亚利桑那提醒我，有些生命不要求被理解：它们只要求不被忽视。

而我不会忽视她们。永远不会。

阿肯色州

阿肯色州是一道缓慢的弧线，穿过丘陵、河流和吱呀作响的木屋。这个州不出声，因为声音会招来不想要的目光。在这里，一切都被

剥到只剩骨头：农活、被遗忘的矿井、与世隔绝的社区，还有一些街区——在那里，贫穷不是一个阶段，而是一份遗产。

这是活在地图之外的美国。财富在西边。现代在北边。留在这里的是其他人：那些别无选择的人。

阿肯色州的女人，守着剩下的一切：不稳定的家庭、摇摇欲坠的房子、缺席或劳累过度的丈夫。阿肯色州的女人早早长大，早早结婚，早早变老。

她是：全职母亲；没有执照的护士；临时充当的心理医生；厨师、司机、教育者；在超市、农场、廉价诊所里拿着低薪的工人。

但还不止这些。阿肯色州还有另一面：严酷、隐蔽，由那些给人权力却夺走生命的工作组成。她还是：知道全国秘密的邮政员；本地公司的经理，没有奖金，没有荣耀，只有压力；税务官员，令人畏惧却被人无视，被文件和低薪压垮；被调到这里的FBI探员，或是惩罚，或是保护，被迫沉默；自来水厂的技术员，为一个连她名字都不知道的社区保障用水；制药公司的工人，那里许诺的是治愈，给的却是累垮人的班次

信仰是一只锚。辛劳是每天的事。孤独是常态。

在这里，女人不追求解放：她们追求喘息。而且常常找不到。

邮局女职员——48岁

在阿肯色州，邮局就在小镇的心脏。它不只是信件和包裹经过的地方：流言、支票、投诉、骗局和忏悔都在那里流转。

她让它浮在水面上。她知道每个人的一切。但没有人知道她的任何事。

对我来说，那就像回到了母亲的办公室。在邮局干了三十五年，有些规律一眼就能认出来：僵硬的等级、只托付给少数人的信任、经手却始终在掌控之下的钱。我进去之前就已经知道会得到什么样的回应。可预见性是一种优势。

Kriss，48岁，局长，为我打开她办公室的门，简直像个玩笑。她立刻把我当成“外国顾问”，带着那种好奇与不信任交织的神情——那是习惯了不信任任何人、却又厌倦了一切都自己扛的女人才有的神情。

她先给我看她能做什么。然后，更有勇气地，给我看她想要什么。

第一道屏障一越过，与钱和她日常工具的接触便化解了其余的一切。她开始说话。与管理层的艰难关系、职业上的阻碍、落空的承诺、没完没了的检查、零认可。

“我需要又快又有效的办法。”她说。

我只对她说了一句拉丁语，随口抛出，当作挑衅：“Do ut des。”我给你，是为了你也给。

她立刻明白了：“只要你帮我，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

三天里，我为总管理层准备了一系列信件。她读了，会签了，寄了出去。不久之后，召见通知就到了。

她要求我以顾问身份陪她去。我答应了。结果一清二楚：从职员升为经理、加薪、同样的岗位、少得多的检查。

她从办公室出来时高兴得跳了起来。这个问题她至少背了五年，一个星期就没了。

晚上，她请我吃饭。

她穿着优雅地来了，和我在办公室见到的样子不一样。显然有人帮她打扮过：同事、朋友、她的女儿。所有人都参与了这场从“被忽视的人”到“看得见的女人”的转变。

晚饭结束时，她去收银台付账。回来时没有付成。老板拦住了她：账已经结过了。

我事先就交代过：“一分钱也别收她的。这是我的账。”

Kriss笑了。然后她叫我走。“我送你回家。我要给你一份你应得的礼物。”

我很清楚她心里想的是什么。我让她先走，说我过一会儿就跟上。

而我，转身去了机场。我离开了那个州。

三天后，我收到她的一封邮件。她说我的举动让她失望，但她也心怀感激。用她的话说，她遇到了“一个特别的男人，改变了我的人生，却什么回报都不要”。

偏离轨道的FBI探员——38岁

她从华盛顿来，习惯了大案、沉重的简报会，习惯了玻璃围起来的房间里那些决定别人命运的男人。如今她身处阿肯色州郊区的一个分局：廉价毒品、家庭暴力、顽固的沉默。她的权力毫无用处。她的孤独也是。

我去那里，是为了向大使馆申报我的能力和我的弱点。标准程序。我走进她的办公室：Marion，38岁，一名被强制调离的联邦探员。

“我们得直呼其名，Nando。”她马上说，“告诉我：你有什么弱点吗？”

“有。女人。”

她一下子僵住了。“什么意思？”

“我帮她们，能爱就爱……然后离开她们。”

“为什么？”她问。“因为你们总是用同一副牙齿咀嚼，而我们的牙齿多得多。这是行为上的事：不是什么都能抓住，不是什么都能留住。”她现在想被分析了。“那也给我做一次。告诉我我为什么被调到这里。让我看看你看到了什么。”

三分钟。不多。足够让她崩溃。

她的问题很简单：她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在FBI这样的机构里，这是一种诅咒。它让你软弱，让你不可靠，他们会收回你的案子，把你送到一个你造成不了任何损害的地方。

我告诉了她。没有过滤。

一开始，她拒绝。然后她想了一秒钟。接着她哭了出来。她抱住我，就像你抱住一个在别人都没有勇气时对你说真话的人。

随后她签署了证明我身份的文件。那是一个合乎逻辑的举动，但她的签名是带着情绪的。

出门时，我打电话给华盛顿。我申请调动：“把我调到迈阿密。我不能搬到这里。到那里我就自由了。”

六个月后，Marion仍在和我联系。电话、邮件、约见的请求。

我总是对她说同一句话：“没有未来。我已经在别处了。”

她没有放弃。她是FBI的人。而FBI一旦盯上你，就不会马上放手。

制药厂女工——55岁

她在一家为全国生产药品的工厂工作。一个强烈的讽刺：她治愈别人，却毒害自己。浓烈的化学品、艰苦的班次、只能挡住一半的口罩、什么也挡不住的工资。

没有人知道她的名字。每个人都吃着经过她双手的药片。

我的进入并不在计划之中。一切始于新冠之后的一顿晚饭，我笑着说我打了四针辉瑞，全是同一批次的，而那一批里有一种“伟哥变异株”，保证效果永久。一个玩笑。我的那种玩笑。

但邻桌有人听见了。消息传遍了全国。然后传遍了全世界。

那家制药公司想见我。想弄明白。想核实。因为在美国，一点好的社会话题就能让股价翻倍。

他们带我进了工厂。我一进门，130个人站起来鼓掌。我满脸通红，而他们确信我就要揭开那个“秘密”了。

我说了实话：“那是个玩笑。”他们不信。

经理、高管和秘书们围住我：每个人都想要一个细节、一个确认、一点技术上的真相的暗示。

但请求和我单独谈谈的，是一名工人，55岁，双手被化学品毁了，背因多年看不见的劳作而弯了。他们把她带进一个房间，和我在一起。她进来时很消沉。空洞。疲惫。

我们谈了四十五分钟。

不谈疫苗。不谈批次。不谈神奇的药效。

我们谈生活。谈那些被当作正常的失败。谈那些被埋葬的梦想，因为在那里，没有人有做梦的奢侈。

我只告诉她一个真相：“做梦治不了病，但能救命。而且它比你们生产的最便宜的药还便宜。”

她笑着走了出去。同事们看着她，仿佛她找到了万能的解药。

“他跟你说了什么？”他们问她。

她没有回答。我也永远不会说。

那是世上最简单的秘密：话语，如果你知道把它们放在对的地方，就能在没有空气的地方打开空间。

而对她来说，那一天，仅仅能呼吸就够了。

优雅的女贼——30岁

她偷，不是出于本能。她偷，是因为阿肯色州不原谅那些生来一无所有的人。

她有教养、聪明，出色得令人害怕。她本可以成为经理、教授和顾问。可她却成了一道影子：游走于房子、聊天、身份、承诺和错过的机会之间。

我是在网上认识她的。Skype上来了一个求助请求，一个干净的资料页，一个像暗号一样的名字：Last A。说她漂亮是一种侮辱。漂亮是轻描淡写。说她是小偷很自然。说她蠢很正常。一个化着完美妆容的谜。

她向我求助。我给了她。

一年之内，她收了14,000美元，全都是为了她说的那些需要。从未见面。从未视频通话。从未通过电话。只有数字信件、精心编写的请求、看起来像是真的紧急情况。

那是我遭遇过的最甜蜜的骗局。

最后，我决定去找她。小石城。Bill和Hillary Clinton的城市。

我见到了她的母亲Rita。一个善良、迷糊的女人，并不真正了解自己的女儿。她见到我时没有一丝慌张；事实上，她还向我要更多的钱，自然得就像呼吸一样。

就在那一刻，我看清了真相。

她不是一个人。她与加纳的一个团伙有联系。她把收入的55%交回去。一个迫于生计的职业骗子。所有人都问我，怎么会掉进这么肮脏的把戏。怎么会相信。付钱。坚持。接受。

但答案很简单，我心里清清楚楚：

生来就是为了帮助别人的人，不会往坏处想。他们只看见自己能做的好事，即使世界给他们看的是另一回事。

尾声——阿肯色州

阿肯色州不是一个州：它是一个缓慢的陷阱。一张由贫穷、沉默、微薄的工作和悄无声息地褪去的生命织成的网。我在这里遇到的女

人并不求救赎。她们只是在求一个能呼吸的地方。

邮局女职员，全国所有秘密的女王，只想找回自己的价值。FBI探员，从高处跌落，与自己的搏斗多过与罪犯的搏斗。制药厂女工，隐没在药片和化学品之间，一点一点毒害自己，拯救了世界。而那位优雅的女贼……她是这个州最完美的象征：聪明、出色，却被迫走上生活强加给她的那条路。

阿肯色州让我看到一件简单的事：在这里，女人尽其所能地活下去。有的撑住了。有的逃走了。有的滑入阴影，因为那里从来没有过光。

而她们所有人，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始终是缺席的。不是因为她们不在。而是因为没有人看见她们。

反思——阿肯色州

在这个州，我明白了贫穷不是一种经济状况。它是一种情感、文化和精神状况。它是一种深深的信念：认为自己不配得到别的。生在这里的人，必须与一种没有写下来的命运搏斗。

阿肯色州的女人没有未来：她用自己的双手建造一个。每一天。身处一个口口声声谈机会、却只分发生存的社会。

我在这里看清了一件事：

女人不会倒下。

是有人任由她们倒下。

真正的罪不是贫穷。而是那些看着、然后走过去的人的冷漠。

我不走过去。我看，我听，我写。我把这些故事从这片土地里带出来，因为如果我不这么做，它们就会像这里的一切一样被埋葬：埋在沉默、尘土和羞耻里。

加利福尼亚州

加利福尼亚不是一个州：它是一场集体幻觉。

对远远观望的人来说，它是阳光、棕榈树、电影、科技、海洋、美国梦。对从底层经历它的人来说，它是一道持续的裂缝：极端的财富与绝对的贫穷相隔几米，高科技工作与田间采收并存，紧闭的别墅与人行道上的塑料帐篷并存。这是全世界来寻找可能性、却找到早已写好的等级秩序的地方。

对女人来说，加利福尼亚是一个虚假的承诺：表面的自由、被宣告的权利、被炫耀的机会。

但规则永远一样：如果你跟不上，你就消失。

这里的缺席不是沉默：而是被体制抛在身后、头也不回的身体。

硅谷女人——39岁

人们称它为“创新之都”，但硅谷是一块封闭的领地，权力属于男性、白人或亚裔，以工程为本，竞争到近乎疯狂。

在这里，女人官方上是受欢迎的：多元化项目、企业道德准则、性别平等论坛、年报里的微笑照片。

但在那些真正重要的房间里，景象截然不同。

她有两个学位、一个硕士学位、完美的英语和很高的技术能力。她做数字产品、数据和平台。她整天开会，而真正的想法由三个人决定：两个坐在桌边，一个在屏幕上。

他们要求她有软技能、调解能力和同理心。他们给她安排协调的角色，而不是指挥的角色。他们要她在场，但不要她当主角。

在这个体制里，生育是一种后勤上的异常。有福利、有假期、有支持、有冻卵服务、有公司托儿所——但永远带着一个不说出口的条件：你不能慢下来。

如果她怀孕了，她被视为一个潜在的问题。如果她不怀孕，她被看作“穿裙子的男人”，和其他人一样可以被替换。两种情况下，她都是一件工具：从来不是关注的中心。

晚上的会议、“紧急”的周末、与亚洲或欧洲的深夜电话，都不算侵犯你的私人生活。体制要求的是全天候待命。

当她崩溃时——倦怠、焦虑、失眠、意义危机——回答永远一样：瑜伽、正念、私人心理治疗。

从来不是结构性的变革。从来不是权力的真正再分配。

她的缺席不是身体上的：是象征性的。她出现在每一个流程里，却从未出现在最后的认可里。

科技向世界兜售女性赋权的叙事。但在深处，女人仍然是需要被管理的例外，而不是需要被承认的支柱。

中央谷地的移民女工——28岁

中央谷地是加利福尼亚的一部分，游客看不见，电影也不拍。

这是养活半个国家的农业走廊：果园、蔬菜、杏仁、葡萄园、加工业。

在这片土地上，移民女人是这条链条看不见的驱动力。她们来自墨西哥、中美洲，来自没有真正出路的贫穷社区。许多人没有证件，另一些人的证件很脆弱，所有人都处在同样的境地：她们的存在取决于不惹麻烦。

她在田里、温室里、包装厂里工作。累人的班次、弯着的背、酷热、空气中的农药、隐蔽而持续的监视。她说得少，看得多，什么都听。

工资很低，常常低于实际的最低标准。加班时间并不总被记录。病假得不到保障：缺勤的人会被替换。

暴力普遍存在，却往往没有记录：工作中的骚扰、性勒索、丢掉工作的威胁、被举报给当局的威胁。

举报意味着冒失去一切的风险。沉默意味着还能继续给孩子们带点东西回家。

她的缺席是制度性的：她不出现在公共统计里，她没有代表，她不参与决定农业的讨论，在讨论生态转型或可持续供应链时也没有人征求她的意见。

她是那个撑起整个国家的食物、却无权在官方叙事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女人。

加利福尼亚把自己包装成“绿色”的，关心环境、健康和未来。但在它农业腹地的田野里，女人们在与任何口号都相悖的条件下劳作。

形象产业的女人——32岁

好莱坞、电视演播室、数字平台、经纪公司、广告、社交媒体。加利福尼亚建起了一种以形象为基础的全球经济。在这台机器的中心，是被当作表面来使用的女人。

演员、群演、模特、网红、背景人物。对她的首要考量不是道德的、文化的或职业的：而是审美的。

“女性角色”有明确的类别：拍广告的年轻女人；家庭广告里的“普通”女人；面向某些受众的过度性化的身体；面向另一些受众的令人安心的形象。

选角不只是挑选：它是一道文化过滤器。它决定谁可以展示，谁可以营销，谁可以被拒绝。

明里暗里的要求永远一样：保持在某个体重之内；接受化妆、修图、改造；适应刻板的剧本；不要反驳付钱的人。

任何试图拒绝某些场景或情境的人都被认为“难搞”。举报虐待或勒索的人会被孤立、被贴上标签，常常被沉默地替换掉。

全球的大型广告大谈身体积极、尊重、赋权和包容。但在办公室的走廊里、在试镜中、在制作会议上，真正的标准依然陈旧、平庸而暴力。

在这里，女人作为形象是超可见的，作为自由的主体却是隐形的。

她的缺席是心理上的：她与自己断开了，被变成一个品牌，被迫用数字来衡量自己的价值：浏览量、点赞、粉丝、互动。

在每一张印在广告牌上的完美面孔背后，都有一个人，对自己被如何呈现几乎没有任何控制。

无家可归的女人——50岁

加利福尼亚也拥有美国最庞大的无家可归人群之一。

立交桥下的帐篷、沿着水渠的临时营地、住在车里、破旧的露营车里和被变成居住走廊的人行道上的人。洛杉矶、旧金山、奥克兰、圣迭戈：贫穷无处不在，看得见，却被无视。

无家可归的女人双重暴露：作为一个穷女人；作为一具脆弱的女性身体。

她往往有这样的经历：付不起的房租；丢掉的工作；毁灭性的分居；家庭暴力；没有得到治疗的健康问题；被当作麻醉剂的成瘾。

夜晚从来不是休息：而是防御。守住几样东西：一个睡袋、一个包、一份证件、一段记忆。社会服务是有的，但它们：缓慢、不足、官僚、有时令人屈辱。

无家可归的女人逃出了精确的统计：她们四处移动，换地方以躲避袭击，因为害怕而不去收容所，不带孩子去服务机构，怕孩子被带走。

她的缺席是道德上的：社会看见她，却不承认她是自己的一部分。她被描述为一个问题，从来不是政治和经济选择的结果。

谈论数字包容、创新和可持续未来的加利福尼亚，与这样的女人共存：她们在公共喷泉里洗头，在停车场换衣服，靠施粥所吃饭。

她们没有一个是“极端个案”。她们是一种模式的正常后果，这种模式把那些承受不起生活成本的人的沉沦视为不可避免。

尾声——加利福尼亚州

加利福尼亚是世界的橱窗，同时也是它的后屋。

从外面看，它展示：科技、电影、音乐、大学、创新

从里面看，它隐藏着：农业剥削；房地产不平等；极端的不稳定；成瘾；结构性的无家可归。这里的女人缺席，不是因为缺少她们。而是因为形象的饱和。

当一个地方不断地在每一处展示女性的身体——屏幕、广告牌、视频、广告、社交媒体的信息流——它就给了世界一种女人处在中心的幻觉。

实际上：在科技行业工作的女人掌权很少；田里的移民没人倾听；形象行业的职业女性被压缩进预制的角色；无家可归的女人被人用目光回避。

加利福尼亚证明，缺席不只是空无：它也可以是没有真正权力的过度呈现。

这是一个女人无处不在、却远比世界想象的更少被承认的州。

反思——加利福尼亚州

在阿拉斯加，缺席是严寒。在亚拉巴马，它是历史。在亚利桑那，它是边境。在加利福尼亚，它是化妆。

在这里，女人的缺席被这些东西掩盖：进步的口号、政治正确的广告、关于平等的会议、励志的故事。

我们谈论“包容”，但真正的包容由三个具体的参数来衡量：谁做决定、谁拿更多的钱、谁有底气说不。

在这三点上，加利福尼亚的女人——在所有社会阶层中——太常被落在后面：

经理被容忍，只要她不要求完整的权力；移民被留下，只要她能扛住重活而不抗议；形象行业的职业女性被利用，只要她符合目标受众；无家可归的女人被无视，只要她不妨碍交通或体面

世界看向加利福尼亚，以理解未来。但如果它真的去看那些让它浮在水面上的女人，就会发现一个简单的真相：

一个把缺席视为常态的地方没有未来，缺席的是

那些支撑它的人。

这就是加利福尼亚被收进这一卷的原因。不是作为神话，不是作为明信片，不是作为敌人。而是作为证据。

世界想象力的首都之一，在这里最难看见的东西始终如一：那些从来不会出现在屏幕上的女人的真实生活。

科罗拉多州

科罗拉多是一个假装简单、其实并不简单的州。这是活在两个极端之间的美国：

看起来像是庇护的群山；像社会实验室一样运转的城市

这是一个干净、有序、表面上进步的地方，但矛盾显而易见：高得令人望而却步的生活成本、看不见的隔离、技术性的工作、封闭式社区，以及无声的社会孤立。

在这里，女人消失不是因为明显的暴力。她们消失，是因为过度的秩序、文化上的压力和令人窒息的社会期待。

科罗拉多是一个要得多、给得少的州。生活在那里的女人维持着一种艰难的平衡：

技术性和脑力的工作；要求全身心在场的家庭；观察并评判的社区；没有空间的心理健康；伪装成“生活质量”的地理孤立。

在这个州，你倒下不是因为有人推你。你倒下，是因为没有人看见你在滑落。

丹佛女人——35岁

丹佛现代、实用、干净。人人都在谈科技、创业公司和生活质量。但实际上，这是一座向女人要得很多、给得极少的城市。

她是一名职业女性：学位、技术能力、稳定的工作、中高收入。

纸面上，一切都很完美。

她生活在持续的压力之下：业绩、目标、会议、项目管理，每周都要有可衡量的结果。

公司谈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却要求随时待命。

她有一套昂贵的公寓、排满的日程和一丝不苟安排好的生活。她不是因贫穷而倒下：她是因精疲力竭而倒下。

她的缺席是精神上的。她总在工作，总在思考，把一切撑在一起——直到某样东西断裂。而当它断裂时，是在沉默中断裂的。

山区女教师——42岁

出了丹佛和博尔德，科罗拉多就换了一副面孔。群山、小社区、冬天少有人留下、夏天游客蜂拥而来拍照的小镇。

这里的女教师是这片土地的支柱：她教书、她引导、她陪伴、她认识每一个人、她是心理支持、她是孩子们的大家庭。

她生活在大雪、偏僻的道路和小学校之间。她的工作量巨大，工资有限。

她的缺席是制度性的：她支撑着社区，却从不参与政治决策。她是那个努力让整个地方浮在水面上、却得不到承认的女人。

原住民保留地的女人——30岁

科罗拉多“看不见”的部分是它的保留地。那里，历史比现代更沉重。

原住民女人承受着三层压迫：结构性的贫穷、内部的父权文化、外部的制度性遗弃。

她常常在社会项目、部落学校和简陋的卫生中心工作。她与成瘾、抑郁、家庭暴力以及一种彻底隔绝的地理距离搏斗。

她的缺席是文化上的：现代的科罗拉多不认为她是自己身份的一部分，而她的社区也并不总是承认她重塑自我的权利。她是一个支撑着整个民族、却被世界无视的女人。

滑雪胜地的女人——27岁

阿斯彭、韦尔、布雷肯里奇、特柳赖德。奢华、金钱、冬季运动、季节性经济。

在这里工作的女人——女服务员、调酒师、缆车操作员、前台、教练——过着双重世界的生活：

极其富有的游客、撑起一切的工人

她工作没有固定时间，工资过低，而且常常朝不保夕。她和其他工人合住狭小的房间，才付得起房租。

她被财富包围，却依然孤立。她必须应付傲慢的游客、季节性的经理和没完没了的要求。

她的缺席是经济上的：她为所有人创造财富，自己却依然贫穷。

尾声——科罗拉多州

科罗拉多是一个看似完美、其实并不完美的州。它有序、富裕、现代、社会平衡——在纸面上。但它的女人生活在三条断层线上：

精神压力、地域隔绝、制度性缺席

没有丑闻，没有大规模的暴力，没有混乱。正因为如此，她们的缺席更加沉重。

在这里，女人倒下不是因为有人推她们。她们倒下，是因为所有人都以为她们撑得住。

反思——科罗拉多州

科罗拉多女人的力量不在于制造声响。也不在于上新闻。

这是一种微妙的、现代的、聪明的缺席。难以辨认，容易忽视。

科罗拉多教给我们一件简单的事：缺席不只是贫穷、暴力、寒冷或禁锢。它也可以是秩序。它也可以是安康。它也可以是期待。

当一个女人被压垮不是因为混乱，而是因为“一切运转良好”，那么问题是看不见的——但它是真实的。

这就是为什么科罗拉多也在这里：为了记住，女性的缺席不只有一张面孔。它有五十张。每个州一张。

康涅狄格州

康涅狄格是一个许多人想象过、却很少有人真正了解的州。从外面看，它很优雅：无可挑剔的小镇、干净的郊区、出色的学校、昂贵

的汽油、整洁的人行道、草坪完美的房子。这是美国“高端”的一面，从不提高嗓门的一面，负责组织、治理和管理的一面。

这里的一切看似平衡，但这种平衡并不自然：它是一种持续的压力，是对体面、外表和期待的不断维护。

康涅狄格不要求你闪耀。它要求你永远不犯错。

这是一个只有三件事成立才能过得好的州：社会竞争、情绪控制、社区无声的评判

这里的女人消失不是因为贫穷或明显的暴力。她们消失，是因为被迫的适应。一种礼貌的消失：没有呼喊，没有丑闻，没有新闻。

这是一种精致的缺席，但仍然是缺席。

保险公司的女职员——40岁

康涅狄格是美国的保险之都。哈特福德到处宣扬这一点：“Insurance Capital of the World。”

在这些口号背后，是成千上万坐在永无止境的屏幕前的女人：理赔、保单、风险算法、电子文书、流程、指标。

她们的工作精确、技术性强，管理得一丝不苟。每一个错误都让公司赔钱，也耗掉她们的时间。每一个决定都必须有理由、有记录、被批准、被验证。

一天是一条控制的链条。

她把这一切撑在一起，因为体制期待她无可挑剔。而且工资不错：和别的国家相比，非常好。

但情感上的代价极其高昂。

这里的女人不会崩溃。她们慢慢地被掏空，不发出任何声响。因为在这些办公室里，没有人问你过得好不好。他们只问：“进展怎么样？”

她的缺席是精神上的：每天都在场，却与自己断开了。

富人郊区的女人——45岁

康涅狄格富裕的那一部分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巨大的房子、安静的SUV、完美的花园、私立学校、古老的社交规范。

在这里，女人并不总在“外面”工作：她们在社会体系之内工作。

她的角色是文化性的：无可挑剔的母亲、步调一致的妻子、在各种委员会中露面、管理家务、按计划做志愿者、完美的形象。

如果她崩溃了，她不能说。如果她不幸福，她不能表现出来。如果她孤单，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她的缺席是身份上的：她消失在自己必须扮演的角色背后。

在一个“一切都完美”的地方，她承受不起露出任何裂痕。

这是一座优雅的监狱，但仍然是监狱。

精英大学的女人——34岁

纽黑文坐落着这个星球上最负盛名的大学之一：耶鲁。

学术环境看起来进步、现代、体贴。但表面之下是僵化、激烈的竞争和高得离谱的期待。

女研究者活在一个悖论里：她有学识、她有能力、她有准备、她是文化生产的核心。

但她也被体制压垮。

论文、会议、科研经费、文章、指导学生、教学、内部关系。一种渗透进生活、头脑和身体的持续努力。

女同事常常是对手。男同事依然把持着历史悠久的讲席。

她的缺席是制度性的：她产出的知识支撑着大学，但她的职业生涯进展得更慢、更不确定、更悬而未决。

许多人坚持着。许多人离开了。

耶鲁依然完美。她们不是。

混居街区的女人——31

岁

在富裕的郊区之外，远离精英大学，才是真实的康涅狄格：低工资、高房租、不稳定的工作、混居的社区，以及一个并不总是运转的社会体系。

这里的女人是隐藏的支柱：她们在超市、公立学校、集体住所、福利服务机构、小企业和基层医疗中工作。一切都撑着：低薪的工作、孩子、大家庭、缓慢的公共交通、持续的压力。

她的缺席是经济上的：她工作很多，挣得很少，毫无进展。

她活在一个惊人的悖论里：她生活在美国最富有的州之一，却感觉不到自己是财富的一部分。

因为这里的财富是私人的，不是社会的。

尾声——康涅狄格州

康涅狄格看起来“安全”“干净”“稳定”。在某些方面，它确实如此。

但它也是女人最容易无声消失的地方之一。不是因为暴力，不是因为饥饿，不是因为寒冷。而是出于社会的期待。

这是一种表面光滑的缺失：没有混乱，没有喊叫，没有惊人的统计数字。只有被高要求和低回报压碎的生命。

没有人注意到，因为一切都在运转。而这恰恰是它危险的地方。

反思——康涅狄格州

在许多州，缺席是显而易见的。在这里，它是低调的。礼貌的。“正常的”。康涅狄格表明，一个女人可以拥有：一个家、一份工作、一份收入、一个安全的街区、一个体面的社区。

却同时作为一个人完全隐形。

社会的完美是一片薄薄的刀片。它要你微笑，同时夺走你的空间。

康涅狄格告诉我们，缺席也可能来自过多的秩序、过多的体面、过多的控制。

而且没有哪个社会是真正先进的，除非它允许女人在场，而不必完美。

特拉华州

特拉华是一个滑溜的州。小、安静，财政上捉襟见肘。它看起来像个小细节，却是美国运转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

这里没有巨型都市、沙漠、高山或炫目的镜子。这里有一种隐藏的经济、低调的政治，还有一套悄无声息地调动数十亿的官僚体系。

特拉华是美国注册公司、存放资金、结清账目的地方。一个处在中间的地方：不太富，不太穷，不太吵。

这是一片完美的灰色地带。

在特拉华，女性的缺席不会爆发。它会蒸发。缓慢、稳定，在数字和公共话语中都看不见。在这里，女人消失是因为无声的超负荷，因为那些小到不值一提的工作，因为那些从不进入国家叙事的角色。

企业办公室的女职员——38岁

特拉华是一百多万家美国公司的法定所在地。这里归档着公司文件、合并、信托、所有权变更、税务文件和价值数十亿的交易。

世界以为这份工作是大经理们做的。其实是坐在没有窗户的隔间里、处理无尽文件流的女人们做的。

她在一间井然有序的办公室工作，满是规则、流程和检查。她几乎从不出错，因为一个错误可能损失数百万。她快速、精确、隐形。

她的一天由这些组成：表格、签名、协议、核查、邮件、清单。

她的工作支撑着整个经济体系。但没有人看见。没有人承认。没有人谈起。

她的缺席是结构性的：她让一个纸上的帝国浮在水面上，却从未出现在权力的叙事里。

仓储物流女工——33岁

特拉华不只是官僚体系。它也是港口、货运、仓储和供应链。

这里的女人在这些地方工作：冷库；分拣中心；工业仓库；食品公司；夜间调度。繁重的班次、快节奏、弯着的背、冰冷的空气。重复的动作、受伤的风险、持续的监督。

她的工资很低。她的合同常常不稳定。她的生活没有余地。

她的缺席是经济上的：她努力工作，挣得很少，从不成长。

她是那个撑起商业隐藏部分的女人，而世界只看向大城市。

基层医疗的女人——47岁

特拉华没有庞大的医疗体系。它有一张最低限度的、极其脆弱的基层医疗网络。

这里的女人支撑着：养老院、小诊所、社区诊所、居家护理、对孤独老人的照顾、被遗忘的慢性病人。

她的工作是情感上的、身体上的、持续不断的。她看到的痛苦多过她能承受的。她加班却得不到认可。她挣得比她应得的少。

她的缺席是社会性的：她在国家够不到的地方替代了国家，却没有人认为她是这个体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当她不在时，一切都会崩塌。但当她在工作时，没有人注意到。

低收入街区的女人——29

岁

特拉华也有它脆弱的部分：被贫穷、家庭暴力、毒品和忽视所标记的街区。这里的女人同时面对三个问题：不稳定的就业、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和微薄的社会保护。

她做收银员、清洁工、季节工、保姆和厨房帮工。她清洗、打扫、照料、收拾别人的家。

她的一天是一场奔忙：孩子、公交车、班次、购物、家务、问题。

她的缺席是城市性的：她生活在一座谈论复兴的城市里，而这座城市却把在最艰难的时刻让它浮在水面上的女人们抛在了身后。

尾声——特拉华州

特拉华没有加利福尼亚的戏剧性，没有阿拉斯加的冰冻严寒，也没有南方的严酷。

它有某种不同的东西：作为一种隐形形式的正常。

在这里，女人的工作不发出声响，因为它是：技术性的、重复的、必不可少的、沉默的、没什么故事可讲的。

从来没有爆炸。只有持续的磨损。

女人不上头条。她们不集体抗议。她们不要求空间。她们只是忍受。

而这恰恰是让她们隐形的原因。

反思——特拉华州

特拉华证明，女性的缺席可以呈现一种更加隐秘的形式：对沉默的完美管理。在这里，女人是这些事情背后的驱动力：官僚事务；协调；基层医疗；最低限度的服务。然而，她们从不出现在美国的故事里。缺席不是噪音。它是背景。特拉华就是证明：一个国家总在经过、而女人总在原地不动的地方。

Ferdinando Frega